

“天那么大！地那么宽，平！油菜花那么黄，香！小麦那么青！清澈见底的沟水，那么流！流得汨汨的响，并且那么多的竹树！”《死水微澜》开篇，李劫人这样描写成都平原，几乎所有他的小说中都以成都为背景。巴金曾专门写过《成都日记》：“早饭后步行去永兴巷访傅抱石（著名画家），他约我同去（杜甫）草堂寺……三点和江苏画家们同去武侯祠和望江楼……三点后宗林车来，接我到东胜街，步行到人民公园看菊花、喝茶”，细细记述在成都生活的点滴。从成都望江楼畔出发，艾芜开始了一段长达六年的南行，并最终写成《南行记》。

他们都是成都人，共同经历了19世纪、20世纪之交成都的风云变幻，是四川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。他们用文字留下故乡成都的影像，而成都也为他们留下时代的记忆。如今，沙河铺的李劫人故居、正通顺街的巴金故居、新都清流镇的艾芜故居，每一方庭院都凝固着一段历史，成为人们缅怀大师、重温近现代成都文化史的好去处。

慧园再现巴金童年生活

寻找巴金故居并不容易。现在的正通顺街130号是巴金故居的位置，这里原是一座五进三重堂砖木平房建筑的深宅大院，1904年巴金出生在这里，并在此度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，直到1923年去南京读书。如今，那座大院早已拆除一空。

草市街街道办事处双眼井社区主任张幼华将我带到不远处的双眼井。“这双眼井曾经就在巴金故居的屋后花园中。”51岁的张幼华一直居住在这附近，也曾走进过那座大院，“现在，这口双眼井是巴老出生地唯一的标志性建筑。巴老生前曾说过：‘只要双眼井在，我就可以找到童年的足迹。’”

巴金定居上海后曾5次回到成都。1987年

10月，巴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故乡，在寻访故居时看到双眼井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，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……”



双眼井 尹婕摄



巴金雕像 尹婕摄

生前最关注的学校。校训石上写着巴金对孩子的期盼：“说真话、做好人”；操场上，端坐着巴金塑像，经常有学生自发给他系上红领巾。

学校校长赖哈梅介绍，1991年5月，东城根街小学师生收到巴金爷爷的第一封来信和一本《巴金和儿童文学》，此后也保持着书信往来。在学校的“巴金书屋”内，至今陈列着学校孩子与巴金多年以来交流的照片、信件、赠书等珍贵资料。2008年11月25日，在巴金诞辰104岁的日子，东城根街小学正式更名为“成都市巴金小学”。“学校每年举办巴金文化节、主题征文，还会给六年级学生专门在巴金纪念馆举办一个毕业典礼。”赖哈梅说，在孩子们的心目中，巴金就是一位亲切、值得学习的爷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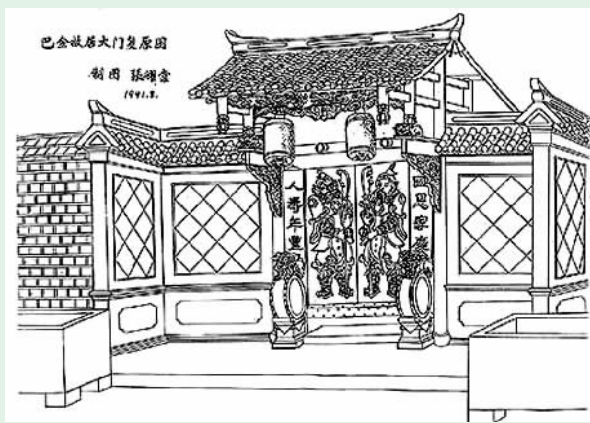
寻找巴金的文化足迹，百花潭公园里的慧园一定要去。这是仿照巴金故居、参照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里的描述，重修的一座川西民宅。1987年，慧园主体建筑初步竣工，巴金还特意回去看了，并赠送了许多物品，诸如老唱机、钢笔、书桌、老式台灯、旧沙发等。巴金曾说，希望能和自己最爱的大哥和三哥相聚在慧园，足可见其对慧园的喜爱。



巴金小学



巴金小学里的巴金书房一角 尹婕摄



巴金故居大门复原图
制图 张明金
2014.12.

李劫人故居修旧如旧

太阳透过淡淡的云层洒向深秋的成都，温暖而不刺眼。转过成都东郊的狮子山，在一条由白墙青瓦围成的小巷尽头，静立着一座古朴的宅院，上面题着“菱窠”二字。

墙壁洁白的瓦房、小桥流水、亭台轩榭、郁郁葱葱的树木，错落有致。菱窠的格局处处透出主人的审美情趣，虽无苏州园林的精致典雅，却更质朴、自然、开放，充满四季的野趣与平民生活的气息。一条铺着大块鹅卵石的小径弯曲指向院中的李劫人塑像，塑像背后是故居主楼，一楼一底，楼下依李劫人生前布局，东为客厅，西为李劫人夫人的卧室，中间是他的书房兼工作室，楼上作为藏书之用。



修复后的李劫人故居

从1939年春举家迁入菱窠，到1962年12月与世长辞，24年间，李劫人一直在这里居住、创作、工作，完成了长篇小说《天魔舞》和《死水微澜》、《暴风雨前》、《大波》三部曲的修改和重写，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《好人》；翻译了相当数量的法国文学作品；梳理成都地理历史、风土人情的《说成都》、《二千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》等，也是在此所作。

对这种远离尘嚣、清静放松的写作环境，李劫人深感满足：“我修建了这几间茅屋，才算有了自己的住宅。今后可以不再随时担心搬家，数十年来所置备的几千本中国书（现已达二万多本）和报纸、杂志，也不致再像以前那样散失了……忙累了几年，一旦乡居，身心倒为之一爽。”

在一盏盖碗茶的香气中，李劫人故居纪念馆馆长杨波向我细细说起李劫人和纪念馆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一批批文学青年走出外省，投身北京、上海。而李劫人则安居成都，呼吸着潮湿清新的空气，在飘香的茉莉花茶中走向创作辉煌。他说成都话，用成都话思维和写作，迷恋川味美食，甚至在成都指挥开过一家名为“小雅”的餐馆。

“不少成都本地人，对李劫人都不熟悉，甚至不知道。事实上，李劫人曾经担任过成都市首任副市长，成都人都知道的人民南路、杜甫草堂，还是李劫人在任时主持修建的。”杨波说，成都市政府对李劫人故居的修缮工程十分重视，2013年建筑工程完工，今年2月开始陈列布展，展场总面积扩大了一倍。

故居工程遵循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力图恢复菱窠原貌。“比如，按照1959年菱窠大门的建筑样式恢复大门，把1987年正式开放以来一直悬挂的‘菱窠’匾改为竖匾；按照原有家具样式仿制书柜、书匣，按照李劫人捐赠线装书、平装书目购置相关书籍，恢复藏书楼1959年布局等。”杨波说。

今年10月20日，开馆仪式上，李劫人外孙女李诗华连称“没想到我儿时的世外桃源在我眼前复活了！”



李劫人故居里的小雅餐馆 尹婕摄



艾芜故居向游人开放

从成都市区驱车向北行驶约38公里，抵达新都区的清流镇，再顺着乡村小道穿过一片农田，来到翠云村四组。这里坐落着一座典型的四川民居，正房两边延伸出东西厢房各四间，形成凹字形。1917年，13岁的艾芜已经订了亲，在成都接受过新文化思潮的他选择背井离乡，逃离束缚，最终从这里一路南行。

由四川到云南，云南到缅甸，艾芜一路漂泊，艰难谋生。无论环境如何恶劣，一路上艾芜始终带着书、纸和笔，以及一只用细麻绳吊着的墨水瓶，在小客店的油灯下、野外山坡上，写下自己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。也因此，他的这段文学生涯被称作是“墨水瓶挂在脖子上的写作”。最终成就了一部《南行记》，里面既有滇边地地南亚的风情，也有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悲欢离合，以及他本人充满苦难的流浪生涯，它也成为艾芜的成名作和代表作。

艾芜原名汤道耕，因受胡适“人要爱大我（社会）也要爱小我（自己）”的影响，取名“爱吾”，后来演变为“艾芜”。这处经过修缮的故居，今年6

月刚刚对游人开放。艾芜的儿子汤继湘介绍，旧居是一所破旧的房屋，2013年10月，政府出资对旧居进行翻修。不过，院子里的3棵“水冬瓜”树被保留了下来。这座“三合院”保持了艾芜幼年居住时的风貌，屋顶青瓦重重叠叠，根据汤继湘的回忆，院墙和大门顶上还铺上了厚厚的茅草。

在艾芜的《春天》里，对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有着充满深情的描述，被视为艾芜幼年时生活环境的写照。

故居里设有几个展厅，“足迹”部分，以时间为主线，分“童年故事”、“南行记”、“锻炼”和“百炼成钢”展现了艾芜的一生。另一个展厅是学堂和寄语，学堂展出艾芜著作和相关作品，寄语展示全国寄赠和艾芜一生的成就以及艾芜与巴金等作家的交往。



艾芜故居外景（资料图片）



艾芜故居